

七七事变追忆

郭崇兴 蔡亚娴著

人民出版社

主编

政协北京市丰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 人民 抗 日 战 爭 纪念 馆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爭 纪念 雕 塑 园

六七事变追忆

郭志兴 蔡亚娴 著

人民出版社

主编

政协北京市丰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 人民 抗 日 战 爭 纪念 馆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爭 纪念 馆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爭 纪念 馆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爭 纪念 馆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爭 纪念 馆

责任编辑:于宏雷

装帧设计:徐晖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七事变追忆/郭景兴 蒋亚娴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 - 7 - 01 - 006218 - 1

I. 七… II. ①郭… ②蒋… III. 七·七事变(1937)-研究 IV. K26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807 号

七七事变追忆

QIQISHIBIAN ZHUIYI

郭景兴 蒋亚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38 千字 印数:0,001 - 8,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6218 - 1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郭景兴，男，1928年出生于天津宁河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馆员。1948年参加革命，1979年到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工作，1981年任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所长。1984年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处主任。长期从事七七事变和卢沟桥史料的研究。著有《七七事变战场考》、《七七事变战场续考》、《宛平城与武俊碑》等，并参加编撰《卢沟桥文集》。曾任北京历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天海玉鹭拍卖有限公司高级文博专家顾问。

蒋亚娴，女，1931年出生于北京。1949年参加革命。曾任北京十二中学语文教师、丰台三中副校长、丰台区成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1986年受聘参加丰台区政府组织的“七七事变历史文物资料征集小组”。主持卢沟桥文化旅游区主办的有关卢沟桥、宛平城历史等展览大纲的编写和陈列制作工作。参与编写《卢沟桥简介》、《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简介》，主持影视片《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的脚本撰写等。



责任编辑 于宏雷
装帧设计 徐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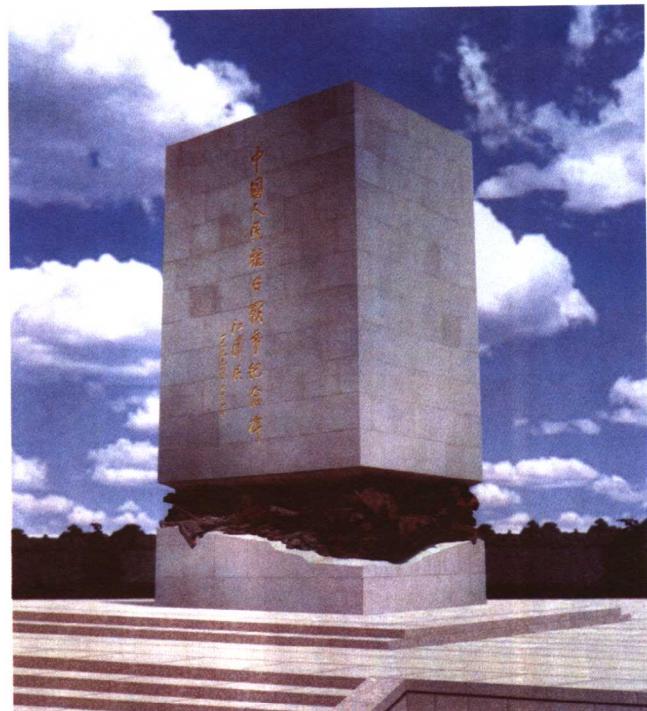
▲为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政协北京市丰台区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初建华率领导班子成员视察卢沟桥、宛平城(右起赵仑副主席、鲍顺新常务副主席、初建华主席、胡燕副主席、于雪鹰副主席、周大春副主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外景

►位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碑高15米，宽8米，厚6.6米。江泽民同志于1999年7月7日亲笔题写碑名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因横跨卢沟河——即今天的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 ▲ 宛平城位于卢沟桥东,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全城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总面积20.8万平方米,原名拱北城,是一座桥头堡,城垣建筑与北京类似。著名的七七事变就爆发于卢沟桥与宛平城
- ▼ 1986年10月,原二十九军部分官兵及子女来到卢沟桥上,前面舞刀者为原二十九军三营炮兵排长杨云峰,他手里的大刀是七七事变时用过的





◆ 守卫在卢沟桥上的二十九军士兵



编 委 会

主 编 沈 强 胡 燕 孙 涛

副 主 编 唐晓辉 李 新 李 一 王广华

编 委 郭景兴 蒋亚娴 段晓微 董化斌
谢立升 王艳秋 沈 眯 许 翔

特约编委 王庆祥 解学诗

执行编委 唐晓辉

纪念卢沟桥抗战七十周年

咏《七七事变追忆》

国破河山寇入深
同仇敌忾万民心
卢沟桥洒英雄血
抗战开篇历史根

郑孝燮 二〇〇七年三月于北京

从妄图不战而取 到发动侵略战争

——七七事变前后日军侵华态势

解学诗

值此七七事变 70 周年之际，我们十分高兴地祝贺郭景兴先生、蒋亚娴女士大作《七七事变追忆》的出版。该书披露了日本蓄意武装侵略中国和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大量罕见珍贵著述与文献，这是被誉为“守桥翁”的郭先生的贡献。郭先生大半生守护在中华民族抗战圣地——卢沟桥，锲而不舍地从事与七七事变有关的文物搜集和史实调查研究工作，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为供作郭先生、蒋女士大作内容的参考，这里主要就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侵华政策，特别是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态势，扼要做些阐述。

一

日本根据其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必然继续采取步骤侵占华北乃至全中国。事实上，他们对华北的侵略，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开始了。1931 年 11 月，关东军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跑到天津制造事变，施展的是双重谋略，即不仅仅拟将溥仪偷运出津，还要占领天津各要冲，破坏杨村铁桥，接应韩

复集^①，酿成华北大暴动^②，妄图在占领东北的同时，消灭在华北的东北军，吃掉华北整块地盘。但由于土肥原预先准备失误，他所操纵的两伙匪徒中的一伙，即所谓“河北治安维持会”派的张壁、李际春等抢先发动，另一伙即杨元吉一派未及参加，再加上中国方面预有准备，有力回击，以致未能达到其预先所策划的结果，最终仅将溥仪偷运出津，送到东北。

到了 1933 年 3 月，关东军进攻热河时，终于跨越长城，把战火烧到华北，甚至逼近平津。关东军司令官在进攻开始时即声明：“如果华北政权对我军采取积极的实力行动时，则不能不引起战祸以至华北”，^③ 同时还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的最后通牒。中国当时部署在长城线上的有华北军、东北军、中央军、义勇军，加上平津驻军共有 20 个师。然而，到了 5 月中旬，正当日军采取当年攻打旅顺的办法攻击密云时，中国军队却受命停止抵抗，开始撤退。5 月 31 日，中方代表在日本提示文本的“塘沽协定”上签了字。中国军警从冀东 22 县撤出，从而使 600 万人口、8000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沦为日方可任意行动的扩大侵华的基地。^④

关东军之所以没有攻入平津而接受停战，主要是慑于英美干涉，也有兵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此后采取的侵华战略是：打击抗日军，胁迫国民政府妥协，建立亲日政权，不战而取华北。中国方面由于“塘沽协定”签订，国民政府再也无法重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而是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特别是 1933 年 9 月庐山会议后，汪精卫取代宋子文任外长，亲日派抬头。黄郛、殷同在华北也积极为执行“塘沽协定”而奔走。因而继大连、唐山会议之后，经过北平会议，从 1933 年 11 月到 1934 年春，伪满和华北之间先后实现了通车、通邮，乃至伪满在长城各口设立关卡。这就助长了日本推行以“华北自治”为名的分割蚕食政策。政策的直接推行者，就是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后

^① 1931 年 10 月初，关东军策划利用山东韩复集军攻击在华北的张学良东北军，为此拟售予韩步枪 1 万支。

^② 片仓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其二）。见《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5 年，第 258—261 页。

^③ 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河讨伐经过概要》，第 5—6 页。

^④ 关东军进攻华北时，还曾唆使张敬尧（安徽人，曾任张宗昌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发动政变，制造亲日政权。结果因张于 1933 年 5 月 7 日在北平六国饭店被暗杀而归于失败。

留下的日本所谓中国驻屯军（军部在天津海光寺，故一般亦称其为天津军），关东军作为搭档，也参与各种行动。

1935年，日本将华北危机推至顶峰。同年1月，关东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关东军声称，察哈尔省沽源县所属之长梁一带应归属于伪满热河省丰宁县，故要求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西，为此派出第七师团“讨伐队”和第十三旅团的全部，由热河向西推进。那里本来已无中国军，故关东军并未与中国军接战。可是，国民政府也还是做了妥协退让，竟与日方达成所谓“大滩口约”，据此中国的宋哲元军再也不得出现在那里^①。关东军的目的是打通多伦至沽源的交通线，占据西进要地，即实行所谓“多伦战略”。

中国的退让，反而换来侵略者的愈加嚣张。1935年5月，华北日本驻屯军出场，他们借口两名报社社长被杀和所谓孙永勤事件，向中国发难和要挟。天津《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和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都是亲日分子，他们分别于5月2日和3日，在北洋饭店与自宅被暗杀。至于孙永勤，乃是奋战在长城线上的抗日英雄，1935年2月进入冀东遵化县境。日军把这些事凑在一起，向中国方面提出，无非是要挟中国的借口。1935年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委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清算蒋介石的二重政策”和由11项内容构成的通牒，内容包括：从华北撤出东北军、中央军、宪兵三团、国民党，严惩杀人者，解散排日团体，河北省府迁移，等等。高桥坦还表示“有必要采取自卫行动”。至于关东军，当然表态支持华北日军。中国国民政府本已软化，可日本政府竟决定借机“一举解决过去的一切悬案”。于是酒井于6月8日又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将河北全省置于几乎与非武装区同样的状态”，并要求在6月10日前必须答复^②。值此关头，关东军迅速向山海关集结，实行武装讹诈。慑于日军威胁的南京国民政府决定，9日由汪精卫电告何应钦“全部答应日方要求”。10日下午何

^① 据满铁总务部资料课：《察哈尔事件概要》（综合情报10第8号，1935年6月1日）载，关东军特从伪都“新京”调3架重型轰炸机。据《国闻周报》（第12卷5期）载，因日军轰炸，东栅子、沽源一带自卫团和居民死亡40余人。关于《大滩口约》，1935年2月2日由北平军委分会公布。

^②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日中事件的经过》，综合情报10号之号外，1935年6月21日。

应钦访高桥坦正式答复，此即后来的所谓何梅协定。当夜，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即由北平南撤汉口。就这样，国民党的军政力量，继冀东之后，被排除出整个河北省。

日本吞噬的目标不单是河北省，而是全华北，所以他们继续在各地寻衅闹事，制造亲日政权。6月27日就制造了炮打北平城的丰台事件。此次又轮到关东军出场，大特务土肥原任幕后总指挥。他一手操纵黑龙会浪人牛达富太郎，一手唆使老牌汉奸白坚武^①，收买丰台铁甲车大队原石友三部下和分裂势力武装“正义军”成员段春泽，但因中国预有防范，由丰台开出的叛乱铁甲车，见永定门紧闭，胡乱打了几炮，便自行逃窜，以失败告终。

日本为了实现分裂中国的华北“特殊化”，以“自治”为名，网罗汉奸进行炮制亲日政权的活动。在日本频频制造事件，特别是迫使中国签署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咄咄逼人情况下，稍有理性的政界人士都是不会轻易倒向侵略者的。但是日本侵华狂人急不可待。1935年9月24日，新任日本驻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原为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在日本记者团午餐会上，公然抛出震惊舆论的爆炸性声明，要求“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为此而不惜诉诸武力。日本政府虽也感到意外，但未制止日军的“华北自治”阴谋。1935年10月3日，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大臣达成的“谅解”，反倒借此要求中国对日亲善、承认伪满洲国和共同防共。^②

1935年10月20日，关东军的土肥原再次出场，伙同另一名大特务松室孝良又制造了香河暴动。在日本浪人和香河劣绅的操纵下，两千暴民以要求减税为名冲城，之后又有二十余名日本宪兵进城推波助澜，全城大乱。日本浪人和劣绅要求县长让出县城，由民众组成政府。香河暴动尚未平息，11月12日关东军再次更大规模地在山海关集结兵力^③。此次武力威胁是针对中国以英资为后盾、与英镑挂钩的币制改革的，但又不单是针

^① 白坚武，原为吴佩孚的政务厅长，在日方指使下，为拼凑华北伪政权曾数次阴谋暗杀于学忠，并策动于的部下叛变。后来，在沈阳还成立了以分裂华北为目的的“正义社”和“正义军”。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303—304页。

^③ 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